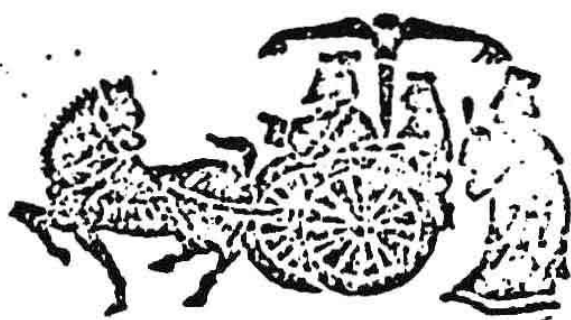




選

載

師門五年記

胡適序
羅爾綱原著

編者按：本刊為紀念胡適之先生逝世一周年，決定選載二十年前羅爾綱先生所寫的「師門尋教記」。羅先生這篇長文是記載他跟胡先生做「徒弟」的經過，其本身不僅具有學術價值，更是一篇感人的傳記文學作品。胡先生在序言中說：「爾綱這本自傳，據我所知，好像是自傳裡沒有見過的創體。從來沒有人這樣坦白詳細的描寫他做學問經驗，從來也沒有人留下這樣親切的一幅師友切磋樂趣的圖畫。」遺憾的是，這樣一本感人的書，却始終「還不曾得與廣大讀者見面」。最初由桂林建設書店出版（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可是「不到多少天，桂林便緊急疏散」，緊接着就是桂林大火，而使這本剛剛問世的小書立即絕版；第二次盧速曾先生計劃把它重印，結果為了等待胡先生的序文而耽誤下來，重印的計劃沒有實現，不久盧先生也去世了；民國四十七年，胡先生自美返國後，「自己出錢把這本小冊子印出來，不作賣品，只作贈送朋友之用」，流傳的範圍仍極有限。為此，我們願意重新刊載並鄭重推薦這本小書於廣大讀者之前。最後有一點需要說明的，這本小書原名為「師門尋教記」，自胡先生在臺重印時改名為「師門五年記」，並且親筆題了這幾個字。

胡適序

我的朋友羅爾綱先生曾在我家裏住過幾年，幫助我做了許多事，其中最繁重的一件工作是鈔寫整理我父親錢花先生的遺著。他絕對不肯收受報酬，每年還從他家中寄錢來供給他家用。他是我的助手，又是孩子們的家庭教師，但他總覺得他是在我家裏做「徒弟」，除吃飯住房之外，不應該再受報酬了。

這是他的狹介，狹介就是在行為上不苛且，就是古人說的「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古人說「一介」的介是「芥」字借用，我猜想「一介」也許是指古代

會作貨幣用的貝殼？）我很早就知道爾綱這種狹介的品行。我深信凡在行為上能够「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與」的人，在學問上也必定可以養成一絲不苟不苟且的工作習慣。所以我很早就對他談，他那種一點不苟不苟且放過的習慣就是他最大的工作資本。這不是別人可以給他的，這是他自己帶來的本錢。我在民國二十年秋天答他留別的信，曾說：

你那種「謹慎勤敏」的行為，就是我所謂「不苟且」。古人所謂「執事敬」，就是這個意思。你有此美德，將來一定有成就。

第二年他在貴縣中學教國文，寄了兩條筆記給我，——一條考定李潛照「金石

錄後序」的「王播」是「王涯」之誤；一條考定袁枚祭妹文的「語已」二字出於公羊傳，應當連讀，——我回他的信，也說：

你的兩段筆記都很好。讀書作文如此矜慎，最可有進步。你能繼續這種精神，——不苟且的精神，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有大進步。古人所謂「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真可以轉贈給你。

我引這兩封信，要說明爾綱做學問的成績是由於他早年養成的不苟且的美德。如果我有什麼幫助他的地方，我不過隨時喚醒他特別注意：這種不苟且的習慣是需自覺的監督的。偶然一點不留意，偶然鬆懈一點，就會出漏洞，就

會開笑話。我要他知道，所謂科學方法，不過是不苟且的工作習慣，加上自覺的批評與督責。良師益友的用處也不過是隨時指出這種鬆懈的地方，幫助我們自己做點批評督責的工夫。

爾綱對於我批評他的話，不但不能我，還特別感謝我。我的批評，無論是口頭，是書面，爾綱都記錄下來。有些話是頗嚴厲的，他也很虛心的接受。有他那樣一點不苟不苟且的精神，加上虛心，加上他那無比的勤勞，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會有良好的學術成績。

他現在寫了這本自傳，專記載他跟我做「徒弟」的幾年的生活。我一口氣讀完了這本小書，很使我懷念那幾年的朋友樂趣。我是提倡傳記文學的，常

常勸朋友寫自傳。爾網這本自傳，據我所知，好像是自傳裏沒有見過的創體。從來沒有人這樣坦白詳細的描寫他做學問經驗，從來也沒有人留下這樣親切的一幅師友切磋樂趣的圖畫。

胡適三十七年八月三日在北平。

× × × × ×

羅爾網自序

三十二年二月，我在桂林遇見廣西省政府參議桂林文化供應社編輯錢實甫先生。錢先生對我說，他正要約幾個人寫幾部自傳式的爲學記，目的是要使青年人知道爲學的不易，不是一出了大學的門就可以學問自炫的。他遇到我，也要約我寫一篇。

錢先生要用傳記鼓勵青年人是意義深長的。但我是一個毫無成就的人，還不配寫自傳。後來經錢先生懇懇的敦促，我再細想，想起我自十九年畢業大學後，直到二十六年秋這幾年間，曾經跟過我的老師胡適之先生做過點工天。我初入師門，適之師就以「不苟且」三個字教我。後來，他不以我中途退學而遺憾，而遺棄我，仍然具肅一團熱望而慈悲的心腸以「不苟且」三個字教訓我，愛護我。雖然到今天我還是個有辱師教的人，但想起往日的師教，使我終生感戴，受用不盡！我覺得我這一段從師故事，或許可以使青年人領會得到一位當代大師那一條教人不苟且的教訓，去做治學任事的信條吧。因此，我才答應了錢先生的邀約。

二月底回到我的家鄉貴縣來，我就動手去寫，三月九日脫稿。我恐怕裏面有不得體的話，不願寄出刊行，我妻陳

婉芬女士也主張請適之師看了再發表，因此便把稿子擱下。這年十一月，我接到錢先生從桂林來電催此稿。我感激錢先生這樣懇切盼望的感情，因此才把它寄給錢先生。錢先生得了此稿，寫信來問我願意要什麼酬報。我回信說，我寫此稿，是爲錢朋友的諾言，故辭謝一切酬報。到了三十三年六月，此書由桂林建設書店印出了。不到多少天，桂林便緊急疏散，所以在那個短促的時光內，此書還不曾得與廣大的讀者見面。

當出書時，建設書店送了幾十部給我，我的一個十二歲的女兒文起，她拿起書來就迷迷的讀下去。我笑問她說：「你也看得懂嗎？」她說：「看得懂，真有趣！」我很奇怪，這本述師教，談考據的文章，小孩子也看得懂？不久，桂局緊張，我倉惶入川，手邊祇帶得一本。初時，不敢示朋友。後來給朋友看見了，一個個的傳觀，他們看了都很受感動，甚至有的看了也陪我流出感激的淚來。他們都主張我重印。我對此小書，本不敢自信，現在給朋友們這麼一說，却也引動我再印的心。我覺得我這部小書，既然小孩子看了受感動，成年的人也受感動，我何幸得親炙師教，何妨把它重印，使千千萬萬的讀者都一樣的受到感動！一樣的受到我師的好教訓！因此，將此書再細細的修改，在嚴寒的深夜裏把它趕抄起來。然後寫信去請獨立出版社總經理盧吉忱（達哲）先生幫忙。承盧先生的感情，所以此書才有重印的機會。

不過，我還得向讀者聲明：我這部小書，不是含笑的回憶錄，而是一本帶着痛楚的自白。其中所表現的不是我這個渺小的人生，而是一個平實慈祥的學者的教訓，與他的那一顆愛護青年人的又慈惠又熱誠的心。如果讀者們能够

得到這個印象，那麼，這一次重印便不爲多餘的了。

最後，我要感激盧吉忱先生和獨立出版社使此書得以重印。同時，我也同樣的感激謝爾網呀！我寫此書的錢實甫先生和初印此書的桂林建設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三日深夜
羅爾網謹誌於四川南溪縣李莊。

× × × × ×

胡適後記

爾網這本自傳是民國三十四年修改了交給盧吉忱的。後來吉忱要我寫一篇

師門五年記

一、初入師門

十九年的初夏，我快要在上海中國公學畢業了。那時候，我在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學習創作，另一條是研究歷史。我是喜歡創作的，也同樣喜歡研究歷史。二者不可得兼，真教我徘徊歧途，莫知所從。後來經過多少次的考慮，我看清楚我自己是個易於傷感的人，浪漫文學的時代已經過去，而且，我對人生的經歷又太淺薄，要去從事創作，也是不適宜的。因此，我便堅決的選擇了研究歷史的路。

路子決定了，我就把我的志願寫了一封信，去請本校長胡適之師幫助我。適之師得了我的信，覆我一封短信說：「此間並無歷史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又遠在北京。大圖書館此間亦甚少。」問我每月需要多少錢，期望多少，叫我告他一個大致，他當爲

短序，我的序是三十七年八月才寫的。可能是我的序把這書的付印推誤了。三十七年八月以後，吉忱就沒有印這書的機會了。四十一年我在北平，向吉忱取得此書的修改稿本。四十二年我去美國，就把這稿子帶了去。

如今吉忱去世已好幾年了，爾網和我兩人成了「隔世」的人已近十年了。這幾年裏，朋友看見這稿子的，都勸我把他印出來。我今年回國，又把這稿子帶回來了。我現在自己出錢把這個小冊子印出來，不作賣品，只作贈送朋友之用。

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七日晨，
胡適記於臺北縣南港中央研究院。

我想法子。

過了幾天，適之師到學校來，我去校長室見他。他見了我，就說：「我知道你，你去年得到學校獎學金，你的文化史論文很好。我讀了你的信，很明白你的情形。你畢業後，如果願意到我家去，我是很歡迎你的。」原來文化史課程是適之師教授的；適之師做中國公學校長，他還要養成一種實勤學風的風氣，在十八年奉學校創辦一種獎學金條例，全校每年以成績最低的五個學生應選，我在這一年的夏天，僥倖首次得到此項獎學金，所以適之師還知道我這個在學校裏無聲無息的一點不活躍的學生。我當初祇希望適之師介紹我入研究院的家去，使我得置身在一位當代大師的師門，終日親炙師教。我當時聽了適之師的話，真是說不盡的歡喜！

到了六月初間，行過畢業典禮，我離開了那濱江臨海的母校，在一個風雨飄飄的夏天黃昏，我到了滬西極司斐爾路適之師的府上去。那天晚上，適之師恰巧宴請張菊生（元濟）先生。張先生是戊戌維新運動的英人，政變後創辦商務印書館，乃中國出版界一個大元勳。適之師把我介紹給張先生，在我面前，一位年高德劭的神采奕奕的老前輩向我還禮，教我肅然起敬。這一個初進師家的第一天黃昏，我和張菊生先生會見的一件事，對我的生命有極重大的影響。因為我在十四年夏天一次熱病後，接連患過神經衰弱遺精胃病各種虛弱的病，中間經過一度嚴重的時期，自己以為生命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了。到十八年以後，雖然身體已經有點康復的樣子，但死亡的黑暗還始終威脅着我。我怕提到一個死字，我怕看見棺材，總之，在我那怯弱多病的身心裏，常常懷着一個死亡的恐怖。後來適之師看出了我這種怕死的心，他就把張菊生先生做個榜樣來教訓我說：「你見過張菊生先生的。他青年時也很多病，因為過於保養，所以現在到了七十以上高年，身體還很好。一個人要有生命的信心，千萬莫要存着怕死的念頭。怕死的人常常不免短命，有生命自信的人，精神才會康健的。」我自從聽了適之師這次勸誡以後，每逢遇到心理發生怕死的恐怖，就立刻想到那天張先生給我的印象，叫我多增加一次生命的鼓舞力，到了二十三年我便完全恢復了我對生命的自信心。

我在適之師家做的工作，是每天幫助他的兩位公子祖望思杜兩弟讀書，和鈔錄太老師鐵花（諱傳）先生遺集。祖望、思杜都能自動的讀書，我不過輔導他們而已；每天主要的工作，却是鈔錄鐵花先生遺集。鐵花先生是清代一位地理學者。他初從三品卿銜吳大澂到吉林防邊，大澂升任廣東巡撫，他又到廣東來，後來大澂轉任河道總督，他又去黃河辦理河工。其後在江蘇候補。到了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又給張蔭桓巡撫部友誼奏請到京去。甲午（一八九四年）中日戰起，時鐵花先生任廣東州知州，明年，清廷戰敗，割臺灣，鐵花先生還死守臺東不退，至力竭始歸。鐵花先生還死守臺東不退，至力竭始歸。適之師說，鐵花先生一生，東北到了吉林，遼寧，南到海南島，東到臺灣，足跡所至，對地理學上多所訂正。他又是一個精幹聰明的人，光緒間中俄交涉，中葡交涉，黃河河工，中日戰爭諸役，鐵花先生均身與其役。此外在廣東時北往韶關，西往梧州考察關稅，南往海南島檢閱軍隊，在臺灣時，巡視全臺軍政。凡所經歷，都有書報報告政府，並有日記詳載其事。故鐵花先生全集，除了地理學的論文有他的學術上的價值外，其全部的、軍政的、河工的史料。他的全部遺集分爲年譜、文集、詩集、申稟、書啓、日記六種，約有八十萬字。要鈔錄這部巨著，不是一件很容易做的工作。因為鐵花先生當時太忙了，他的遺稿不曾經過整理，他又很喜歡修改文章，在他的底稿上，東塗西改，左添右補，煞是難看。鈔寫的人，除非十分小心，並且有耐性，是鈔不下去的。有時還得用校勘的工夫，比方在鈔申稟時遇到那裏的字句實在看不清楚了，就得拿書啓或日記裏面那些記同一事件的部分來校勘，方才可能尋得出他改削的線索出來。因此，這一部巨著，適之師攔置了許多年，還不曾找到一個適當的人去整理，到我來了，才交我鈔錄。我一連鈔了半年多。這半年多的工作，對我個人是多麼重大的訓練，他使我變成了伏案工作時具

有一「小心」，即「耐性」的好習慣。我們知道，「小心」，即「耐性」，是有一種精密的體力，有一種精密的能力，是不能做粗笨和粗率的工夫的。但要做成這種精密的體力，就須先有小心和耐性的習慣。我讀性理學，父母常把「粗魯」兩個字來教訓我，就是直到現在，我除了做研究工作外，一切舉動還是一樣的粗魯的。我妻陳鳳芬女士常笑對我說：「我看你穿衫、走路、說話、吃飯沒有一件不粗魯的，爲什麼你能够整天的做這種比我們女人插花還要精密的考證工作呢？真奇怪！」這不是奇怪的事啊，因為曾經有過一件不許我粗心草率做得來的工作，把我漸漸的磨練出來哩。這是我在大學裏不曾得到的好訓練，這是我做學問的第一課！

二、蒲松齡的三年考

與醒世姻緣傳考證的啓示

當我初入適之師家時，他已經辭去中國公學校長。到了這年冬天，他改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的編譯委員會事，全家從上海搬往北平去。十二月初旬，我們到了北平。

我初到北平時的工作，是整理適之師的藏書。適之師藏書豐富。一部份存在上海，一部份存在北平。上海的運來了，北平的也要開箱。在書房前的大廳上，縱橫的陳列着幾十個書架，適之師指點我把那些書籍分類放在書架上，真個是琳琅滿目，坐擁書城。我乘這個機會，得把適之師全部藏書都翻過，遇到心愛的書，有閒時就拿回房間來細細的讀，因此得讀了許多書，增長了一些知識。

整理過書籍，我乃繼續鈔錄鐵花先

生遺集。到了第二年三月，適之師工作完了。這時候適之師打算動手考證醒世姻緣傳的著者問題，他要證明醒世姻緣傳著者「西周生」就是聊齋志異的著者蒲松齡。他爲了要蒐集蒲松齡的史料，借了兩部聊齋全集的鈔本——一部是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本，一部是瀋川馬立勛先生藏本——叫我先把這兩種鈔本將其中的文詩、詞的目錄來和上海中華圖書館出版的石印本聊齋全集對照，列一個對照表，然後單就那兩種鈔本，校其異同，重新輯錄一部清華本與馬本的混合本聊齋全集。當我做完三種聊齋全集目錄對照表的時候，我將那個表送給適之師說：「石印本的文和詞，除了極少數之外，都是清華本和馬本所收的。最奇怪的是石印本的詩，共二百六十二首，沒有一首是清華本和馬本裏面見過的。」適之師本來已經懷疑石印本的聊齋詩集，看了這個對照表，更加懷疑了。過了兩天，適之師就寫成一篇蒲松齡的三年考（後來改題作「辨偽舉例」）叫我看看，說：「石印本的詩集全是假造的，所以沒有一首和清華本或馬本相合。松齡本來活了七十六歲，張元撰蒲先生墓表，原沒有錯誤，但傳鈔的墓表誤作八十六歲。這位假造的人，誤信了墓表鈔本的一個誤字，深信松齡活了八十六歲，所以假造那三首詩，一首『八十述懷』，一首『已未除夕』，一首『戊寅仲夏』。以坐實享年八十六之說。這個人真了不得！他做了二百六十二首假詩來哄騙世人，許多詩是空泛的擬古之作，如擬陶靖節移居，如擬杜甫鶴宮怨，那是毫不相干的。但他又查出了松齡的一些朋友，捏造了松齡和他的朋友們唱和的詩若干首，又鈔襲聊齋志異的文字和註文，加上了許多詳細的註語，這些註語都好像有來歷的，所以許多讀者都被他騙過

了。」我細細讀了適之師的考證，其中最重要的一條證據，是引用聊齋文集松齡自撰他的妻子劉氏行實的一段話說：「獨人劉氏，……父季調，……生四女子，獨人其次也。初松齡父處士公徵晉……嫡生男三，庶生男一，……松齡其第三子，十一歲未聘，聞劉公次女待字，媒通之。……遂文定焉。順治乙未（一六五五）間，訛傳朝將選良家子充掖庭，人情洶動。劉公……亦從家送女詣塔家，時年十三。」

按松齡生於崇禎十三年（庚辰一六四〇），死於康熙五十四年乙未正月二十二日（一七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六歲。劉氏人生於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比松齡小三歲，如果松齡的生年確如石印本詩集享年八十六之說，要提早十歲，那麼，他十一歲正當崇禎十三年，他的妻子還沒有出世哩。「待字」之說從何說起呢？適之這一條證據，就把石印本的那些假證據都打倒了！接前適之師再從通行有註本聊齋志異裏面，把那些假唱和詩中的朋友姓名履歷的註語的來源，一條一條的都查出來。這一篇辨偽的實例，教我懂得懷疑，教我從此不敢輕信記載。這一個教訓，給我的影響是非常的重大的，後來我做太平天國研究對許多文獻和傳說都不敢輕易置信，常用懷疑的態度去考訂他們，因此鑑別出許多偽文獻和訛誤的傳說，就是受了適之師這篇考證啟示出來的。適之師寫成蒲松齡的生年考後不久，接替他又寫成一驚醒世姻緣傳考證。這一篇考證，適之師經過五六年蒐集材料的工夫，方才將他的動手寫起，乃是紅樓夢考證水滸傳考證後第一篇重要的考證論文。這篇考證的主題，是解答「醒世姻緣的作者是誰」的一個難題。適

之師解答這個難題，經過幾許的波折，其中有大膽的假設，有細心的求證，終於得到完滿的證實。適之師對這篇考證很高興，他說他這一篇考證故事，可以做思想方法的一個實例，可以給將來教授思想方法的人添一個有趣味的例子。所以他在引文上就引了一句「鴛鴦繡取從君看，要把金針度與人」的話。我十分榮幸，在適之師草稿的時候，我就得讀到這篇考證。適之師平時教人做考證有兩個原則：一個是大膽的假設，一個是細心的求證。我在這篇考證裏面，領會到如何大膽的假設而不致流於荒唐無稽，如何細心求證而有線索可尋。後來我考證太平天國三件疑案——朱九淵問題，洪大泉問題和黃蘭問題——寫了朱九淵考、洪大泉考，上太平軍書的黃蘭考三篇考證，便是用這個方法去考證的。就是近六年來我在中央研究院做清代軍制的研究，我最初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說：「清代軍制在綠營時代是兵歸國有的，到了綠營制度崩潰了：湘軍代興，才造成晚清兵歸將有的局面。」經過幾年的細心求證，結果證實了我的假設。我寫了綠營兵志湘軍新志兩部書，專研究這個問題，我覺得我仍然是跟適之師教給我的考證的路走的。

總之，蒲松齡的生年考是教我做考證的態度，醒世姻緣傳考證是教我做考證的方法。從前顧頡剛先生在他的古史辨的自序裏，曾說過他從適之師的水滸傳考證和井田辨等論文裏，得着歷史方法的啓示。如果我的工作還有一點學術上的意義，如果我還說得上是適之師的一個門弟子，那麼，我做學問的態度和方法，便是在這一年裏親承師教讀了蒲松齡的生年考和醒世姻緣傳考證兩篇考證得來的。

三、回鄉省親偶然的

走上研究太平天國的路

聊齋全集的輯錄工作，到二十年秋天便做完了。就在這個秋天裏，先嗣母林老孀人來信說她常常有病，叫我回家一行。我自十六年回過一次家，已經四年不曾歸省。想到暮年的慈母，所以我也想歸去省視。我把這個意思對適之師說了，適之師也主張我回去。當我理好行裝，想到一年半來適之師和適之師母待我的恩禮，愛護我，體恤我，把我當做他們的子姪一樣看待我。尤其使我感激不忘的，我在師家不過是一個家庭教師和書記，地位十分低微，而師家却常常名流滿座，在那種場合之下，我這個既偏狹又敏感的人，當不免會起自卑的心理，適之師却早為我顧到這點，每逢當我遇到他的客人時，他把我介紹後，隨口便故意把我誇獎一兩句，使客人不致忽略這個無名無位的青年人，我也不致於太自慚渺小。有時遇到師家有特別的宴會，座位容不下，他便預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先生到了他宴客那天把我請去作客，叫我高高興興的也做了一天客，不致冷落而起卑微之感。適之師愛護一個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讓他發生變態的心理，竟體貼到這個地步。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到流起淚來。總之，我還不會見過如此的一個厚德君子之風；抱熱誠以愛護人，懷謙虛以禮下人，存忠恕以體諒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覺到一種溫馨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到了快要離開了，却教我這個歸心似箭的游子，興起無邊的依戀。我是不會說話的人，幾次走到適之師和師母面前，要想說半句感激的話都說不出來，我祇好寫了一封信，送到適之師的書桌上，去，略表我的微忱。第二天適之師看見

了，他回我一封信說：

爾網弟：

我看了你的長信我很高興。我從前看了你做的長信，就知道你的為人。你那「謹慎勤敏」的行爲，就是我所稱「不苟且」。古人所謂「執事敬」，就是這個意思。你有此美德，將來一定有成就。

你覺得家鄉環境不適宜你做研究，我也贊成你出來住幾年。你若肯留在我家中我十分歡迎。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幾個條件：

(一)你不可再向你家中取錢來供你費用。

(二)我每月送你四十元零用，你不可再辭。

(三)你何時能來，我寄一百元給你作旅費，你不可辭。如此數不敷，望你實告我。

我用了這些「命令辭氣」，請你莫怪。因為你太客氣了，叫我一百分不安，所以我很誠懇的請求你接受我的條件。

你這一年來為我做的工作，我的感謝，自不用我細說。我只能說，你的工作沒有一件不是超過我的期望的。

適之。

我會經給適之師做了甚麼呢？這一年來，那件工作不是給我自己訓練呢！適之師却如此的款待我，獎勵我。我當時感滿一腔感恩的熱情，帶着那珍貴無比的「不苟且」三字的師教，依依不捨的拜別師門，從北平前門上了火車，向清南國的故鄉歸去。

我的故鄉，在廣西貴縣。當我畢業大學時，先嗣母就希望我回本地做中學教員，好得朝夕侍奉。我回家鄉來，知道老人家的希望，雖然我已預定第二年

的春天再去北平，即使我不忍過拂老人家的意思。恰巧那時侯與兄國吉（爾家）先生舉派回里做縣立貴縣初級中學校長，他約我幫忙，因此我就入貴中去做教員。我教的雖然是初中國文，但我對教書是陌生的，所以很小心地去教學生。有一天，教到李清照金石錄後序，序中有一句說：

嗚呼，自王播元叔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門元凱之病，錢鏐與傳鮮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

這一句話裏面，共用四個故事：長門是晉和嶠字，嶠富擬王者，而性很吝嗇，杜預說他有錢癖。元凱是晉杜預字，預曾作春秋左傳解，自己說有左傳癖。所以清照說「長門元凱之病，錢鏐與傳鮮何殊」。胡椒是用唐元叔故事，新唐書元叔傳載伏法，籍其家，胡椒至八百石。但考新唐書王播傳却都稱播終於位，無被罪籍沒的事，也沒有記他愛好書畫的事。所以歷來註釋家，對清照所用書畫這個典故，都註不出來。我記得從前看宋人葉夢得日齋筆記有唐人王播藏前代名畫，及被禍，為人破垣剔取竄軸金玉而棄書畫於道路的故事，我想，難道是清照把王播記錯做王播嗎？

因檢新唐書王播傳，果然是王播的故事。王播愛書畫，元叔愛胡椒，及被禍，書畫與胡椒同樣遭殃，清照這句話本應作「自王播元叔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才合。她一時誤記，就張冠李戴了！

又有一天，我教到袁枚祭妹文，有這樣的一段話：

汝之疾也，余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戕吾心，阻人走報。及至柳俊已極，阿媽問「望兒歸否」？強應曰：「諾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心知不祥，飛舟渡江。果

予以來時還家，而汝以晨時氣絕，四肢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冀死得予也。嗚呼，痛哉！

這一段話裏「諾已」一辭，我想了許多本坊間出版的教書書和文選來看，都把「諾已」分開來讀：「諾」字連上文讀作「強應曰諾」，「已」字連下文讀作「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這是大錯的。一個人遇到自己不想做的事，給人家勉強了而不得不應承的，那才會有一「強應曰諾」的；如果自己想要的，而無法達到，却給人家問着了，那祇有無奈的勉強付諸一聲「罷了」的嘆息，決不會有一「強應曰諾」的。考「諾已」一辭，是春秋時齊國人的方言，公羊傳：「此奚斯之聲也，諾已！」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悲歎詞，正同現在國語的「罷了！罷了！」的意思一樣。袁枚寫的妹妹臨終時望他歸來而不可得的慘狀，輕輕的用「諾已」一辭表現出來，是何等的淒涼！編選文章的人未加細考，無端把「諾已」一辭分開去讀，便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把袁枚的本意全失了。

我覺得這兩件事，都可以教人做文章得細心，編書的人得細心，教書的人也得細心，所以我便寫了兩段小剖記寄呈適之師請教。那時候，我又無意的在昭代叢書裏集楊復吉的「夢蘭瑣筆」裏，給適之師尋到他在他世姻緣傳考證裏所引邵文如（之誠）先生的骨董瑣記所述鮑廷博說蒲松齡是醒世姻緣傳的作者一段文字的來源，我一併把那部書寄給適之師。適之師見了，他很高興，回我一封信說：

爾爾兄：謝謝你寄來的長信與昭代叢書一冊。你的發現最有價值，因為邵文如說

是鮑廷博說的，這是很晚近的人了。你尋出了他的娘家。楊復吉生於一七四七，死於一八二〇，與鮑廷博正同時，又是朋友，這就把這一段話提到十八世紀晚年去了。楊鮑相會，可考的是瑣筆所記的乾隆壬寅（一七八二）一次，其時去蒲留仙死時（一七一五）不過六十多年，這就很可寶貴了。我寫了一編「後記」，附在序文之後。現在我要特別謝謝你！

你的兩段筆記都很好，讀書作文如此矜慎，最可有進步。你能繼續這種精神——不苟且的精神，無論在甚麼地方，都可有大進步。古人所謂「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真可以轉贈給你。

我們自然極盼望你能來，但你的家庭情形既然有不能遠離的情形，你決不可於此時北來。近幾十年中的最可悲嘆的現象，是內地學生學成之後，不肯回內地去服務。你在內地可以作許多有益於家鄉的事業，萬不可輕易拋棄；除非我能給你一個比現在更可以發展的機會，我也不應該邀你出來。祝

適之。

適之師自始就以不苟且的精神教我，到我回到故鄉來仍舊叮嚀我要繼續這種精神。家國香先生又是個辦事最認真的人，他對公家的事從來一分一毫都不肯苟且，我跟他教書，自然也會受到他的好影響。所以我們在貴中兩年，還算有點小成績，至今還給許多同學們懷念着。當時因為我的家庭不願意我遠離，所以適之師來信叫我在家鄉安心工作。但是，我總覺得我在茫茫的學問大海裏，找不到歸宿，不免焦急着。

做過祖國的研究，寫了一篇春秋戰國民族考。到了適之師家，我便打算把這篇考證去做深入的研，預備寫一部春秋戰國民族史。我根據的史料以左傳為主，並參考世本、竹書紀年、國語、國策、史記、五經、諸子各書。十九年的舊曆除夕，適之師為着要安慰一個在過年的辰光正在想家的游子的寂寞，那天晚上，特地叫我一個人到他的書房去細細問我的研情形。我將寫成的兩章請他看。適之師看了說：「你研究的史料，本身是有問題的，用有問題的史料來寫歷史，那是最危險的，就是你的老師也沒有辦法幫助你。近年的人喜歡用有問題的史料來研究中國上古史，那是不好的事。我勸你還是研究中國近代史吧，因為近代史的史料比較豐富，也比較易於區別真偽。」我當時聽了適之師的話，好似給一盤冷水當頭潑下來一樣，把我研究春秋戰國民族史的心灰了。但我要轉過方向去研究中國近代史，究竟選擇那一個主題呢？爲了在大學裏對中國近代史的生疎，却教我茫然不知所指。適之師這一個黑夜明燈般的指示，一直到兩年後，一個偶然的動機，才把我導引到研究太平天國——一個中國近代史的題目方向上去。

傳記全文如下：

張嘉祥廣東高要縣人，初至貴縣，在水源街全昌號貨舖雇工。旋辭出，往石岐，提牛皮舖榮利之子勒贖。榮利赴縣告，縣令楊曾惠偵循例出票，不嚴拘，因得漏網。道光二十五年，嘉祥寓劉公墟，開寶洋烟館，常從大嶺、平村、博合、大灘往來，交結謝江殿三等賊，以打劫爲生。二十九年，官兵進剿。嘉祥屯割甘塘，聽賊總我招撫。隨與城東門外賊王亞壯串通，挾制富戶，派出錢銀，令其嚴密守衛，強取團練大砲。越年，縣令張公汝瀛蒞任，成大圍，嘉祥船經過，紳士逼繳回原砲，遂往南寧。

我當時讀了這篇傳記，立刻使我想起晚清古文家薛福成也有一篇張嘉祥傳，那是他的「庸齋筆記」裏的。因在書架上抽出此書，翻開那篇張忠武公逸事來看，說：

全反於金田，遣黨招之。嘉祥拒不往曰：「吾之爲盜非不得已也，豈從叛賊者哉！」向忠武公（榮）提軍廣西，使紳士朱琦爲督招之。嘉祥約官軍壓其巢，出禦而偽敗，乃悉括山中財物，散遣其黨，使歸爲良，而自降於布政使勞崇光軍前，改名國傑。得旨賞千總銜，歸向公差遣。

我們將這兩段記載兩兩對照，相差何其遠！貴縣志記的張嘉祥是一個辦人勒贖的強盜，薛氏記的張嘉祥却是一個被迫上梁山英雄。我們究竟相信那一方面的記載呢？我覺得要考證張嘉祥是否被迫上梁山，應該查查當時廣西的吏治情形如何。因此，我就動手去查幾部清代道光咸豐間的文獻。我看見了兩篇重要的史料，一篇是龍啓瑞的上梅伯言先生書，一篇是嚴正基的論粵西賊情兵事始末。這兩篇史料，告訴我們知道廣西自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梁章鉅做巡撫時起，十多年來，做一省長官的巡撫和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以文酒徵逐爲豪舉，他們對地方懲辦盜案的屬員，目爲俗吏，或加之排斥。於是做州縣地方官的，看出上司的意旨，只好縱盜養奸，諱匿不報，成爲一時的吏治風氣，遂造成後來廣西群盜如毛的局面。啓瑞是臨桂人，正基是奉旨派來廣西辦理糧餉的大吏，他們所說這種情形，是最可信的。故可知貴縣志所說「張嘉祥據人勸服，事主赴告，縣令楊曾惠偵循出票，不嚴拘，因得漏網」的話，才是當時廣西州縣地方官的作風，而薛氏所記「嘉祥任俠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盜賊」的話爲失實。因爲修貴縣志的人，還是親見嘉祥在貴縣做強盜始末的人，故他們所記自是實錄，而薛氏是江蘇人，他的記載得自傳聞，便不免失實了。在

薛氏的記載中，還有一件大錯的事，就是薛氏故意把張嘉祥與洪秀全牽上了線。薛氏說洪秀全起事，遣黨去招嘉祥，嘉祥不從，到向榮爲廣西提督才招降了他。按貴縣志記張嘉祥招安之年爲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招安嘉祥的人爲盛總戎，（考梧州府志盛總戎爲南寧協副將盛鈞）而考州鄉曾氏咸忠王李秀成原供金田起事之年爲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六月，考咸豐東華錄向榮之任廣西提督係道光三十年八月才從陝西固原提督調任。那麼，張嘉祥既是在金田起事前一年招安，到洪秀全起事時，即使有遣黨招他的事，嘉祥也不會再說「吾之爲盜，非不得已也，豈從叛賊者哉」的話。而當嘉祥招安時，向榮還未調廣西提督，向榮又何來招降他？薛氏的記載比較研究後，才明白文人的記載，只是做文章，不是事實。中國歷史家往往根據這種記載來修撰，中國歷史的多謬，是怪不得的了。自從那天起，我就喜歡專選道光咸豐兩朝的文獻，做我公餘閒覽的讀物。於是漸漸的引起了我對太平天國史事的興趣，因把家中的藏書和太平天國有關的都蒐集在一處。我記得當時祇有道光咸豐同治三朝東華錄，捫蝨談虎客編的中國近世秘史（中收有忠王李秀成供滿清紀事及太平天國故事若干篇），張德堅賊情彙纂（文匯雜誌節錄本），曾文正公全集，胡文忠公全集，皇朝經世文編等幾部書。我就從這堆簡陋的貧乏的設備裏面，開始我的太平天國研究。

適之師教我懂得懷疑，教我懷疑而後信，而引動我開始太平天國研究的動機，更是由於懷疑薛福成所述張嘉祥故事的傳說，結果更實給我證明了薛氏記載的虛謬。這一件事對我以後研究太平天國有很大的意義。因爲太平天國史事，當時官書野乘已經傳說紛紜，加以清季有一班人又特意偽造太平天國文獻借來鼓吹革命。所以我們研究太平天國史，除非先存一個懷疑的態度，具有辨偽的功力去從事鑑別史料，考證史案，恐怕不免墮於五里霧中，難見真面目。我一開步走就存着懷疑的態度，我覺得我的步伐不會走錯。以後我懷疑洪秀全與朱九海關係，懷疑洪大泉，懷疑石達開的詩文與其出身，懷疑天朝田畝制度的實施問題等等，都是繼續這個步伐進行的。其後幾年，我把我的懷疑一一的考證出來了，便在太平天國研究上開了一種辨偽考信的風氣。我雖然不敢說把太平天國史上的偽傳說文件一掃而空，但多少却給我推翻了。這一點小小的工作，都是從適之師給我的訓練，給我的教訓得來的。

廿二年的春天，我仍在貴中教書。那時候，貴縣成立一個修志局纂修縣志。局長與兩庭（政）先生知道我正在探討太平天國史，他聘我做特約編纂，專負責關於貴縣太平天國史跡的諮詢。局中蒐集有二十多種廣西各府州縣方志，還有一些與太平天國有關的書籍。我乘這個機會，又得閱讀了這一批書。當時我一邊教書，一邊就根據我見到的材料，動手去寫一部「太平天國廣西起事史」，和十幾篇辨偽的附記。等到文章脫稿時，已經到年底了。

四、重入師門

廿三年二月，家國清先生因爲辦學成績卓著，省政府把他升長當時廣西除廣西大學而外另一個高等學府——廣西省立師範專科學校，我便辭了貴中教職，得了先嗣母的允許，決定再往北平從適之師。

我決定了行程，就寫信奉告趙之師。我離家北上。到上海去訪問趙之師。趙之師在放先生，知道趙之師請了我的啓程信，就打電報給放先生請他招待我。我在放先生家中住了幾天，電車通車往北平去。那天車到山東德州附近，因為過遲，車停了半天，誤了點，直到第二天上午三時才到北平。我在那個海軍衙門的仲春五更欲歸天，再入師門。一家人熱烈的歡迎我。原來趙之師昨天已兩次到車站去接我不着，臨臨還打電話到車站去問通車的消息哩。

當我再到師家時，那個在北海公園傍邊建築宏偉的國立北平圖書館，早已經成立了。趙之師要我養成到圖書館工作習慣，叫我每天到北平圖書館去查書。北平圖書館是中國第一個大圖書館，藏書豐富，各種部門都有，我便專看太平天國史料部分。館中藏的太平天國史料，除了許多木刻本外，還有珍貴的未刊鈔本，和從德國國家圖書館攝影回來的太平天國的官刻書多冊。我看了這些史料，才知道我從前在鄉所見的史料的貧乏可憐，根據那些貧乏的史料寫成的「太平天國四起事」稿本算得什麼呢！本來那部稿本已經送汪原放先生歸東圖書館印行的了，我連忙寫信去請原放先生取消前議。於是我就在北平圖書館中，銳意開讀太平天國史料。我除了到圖書館開讀外，自己也收藏太平天國史料的書籍，一天一天的積聚，到今天居然收集了不少，其中還有幾部是公私藏書家未見的孤本和善本。

我在做搜集太平天國史料工作當中，同時還進行一種評判史料的工作。二十三年秋天我在大公報副刊發表一篇「論太平天國史料」，是會國藩把俘獲太平天國的文件，叫他的屬員張德榮編纂的，其目的是要以此書來重振精神，故其史料多有錯誤。這是一部重要的太平天國史料，但其中錯誤甚多。我寫了這篇評記來訂正書中若干條的錯誤。書中有一篇「天國主洪大泉的傳記」，我大膽的懷疑此人大概是清廷大官張尙阿所捏造。當時我還是懸而未斷，到兩年後，材料漸漸的增添，我就證實了我的懷疑。這是我的第一篇評判太平天國史料的文章。接續我又在同一副刊上發表一篇「讀太平天國詩文鈔」，太平天國詩文鈔是羅漢池祖基輯先生合編，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書收有許多偽造的詩文，我根據別種可信的史料，指出那些偽詩文爲贗品。其中關於石達開詩的一部分，我根據石達開的年齡、身世、太平天國的制度、和他的故鄉——貴縣父老的口碑，斷定石達開乃是一個年青的讀書未成名的富農之子，他不曾中舉人，並且不曾補秀才。詩文鈔中那五首出自梁任公次冰室詩話內所謂「客曾國藩」的詩是偽造的；其他所錄許多首詩，也沒有一首使我們信得過的。石達開的詩，據我所見，祇有在廣西邊遠（今宜山縣）白龍洞那首「挺身登峻嶺，舉目望遙空，雙眸張天帝，移民復古風，臨軍稱將勇，玩洞奏詩雄，劍氣冲星斗，文光射日虹」的這首詩的風格思想才是真的，至今原刻尚存，據開詩序與他的大臣的和詩所署的官爵都可以爲證。我在此文中的這一考證，五年之後，爲簡又文先生所採納，他在大風旬刊上撰「太平天國文獻品考」，引了我這一考證，給柳亞子先生看見了，亞子先生就將他自己的兩篇題石達開詩的跋文寄給大風旬刊，他告訴我們石達開詩十九是他和亡友高旭（天梅）在清末鼓吹革命時造的。亞子先生那兩篇有關太平天國

文獻考證的題跋錄於下：

「題石達開水樓刊本石達開詩後
殘山剩水樓刊本石達開詩共二十五首。自等會國藩五首見於梁任公飲冰室詩話外，餘二十首悉出亡友高天梅手筆。時在民國紀元前六年，同鄉授滬上健行公學，天梅爲余言，將撰羅王詩集，供激發民氣之用，遂以一夕之力成之，並及被戮語文，信奇事也。封面題字亦天梅所書。當時釐金印千冊，流布四方，讀者咸爲感動。於是先生詩話，龍潭室詩話，說元室述聞，太平天國野史觀相轉載，而盧前輯石達開詩鈔，羅漢池祖基輯太平天國詩文鈔亦依擬之，異哉！二十八年春題於上海。」

題盧前輯石達開詩鈔後

飲虹閣丁盧前（實野）所輯石達開詩鈔，民國十六年十一月泰東書局出版。記五六年前，實野講授暨南大學，余因衣菲之介，曾共一筆，遂索是書閱之。內容什九爲天梅所作贗品，而頗多脫句誤字，復缺二首，蓋實野未見天梅原刊本，第以先生詩話及龍潭室詩話得之，搜輯可謂勤矣。飲冰室所載五首赫然首列，頗有人疑出任公偽造，與天梅不謀而合，又入川題壁詩據羅漢池祖基太平天國詩鈔，謂見梵天宣發錄，而致石達開四首，則實野固未嘗出處，或實野真贗也。……二十八年四月春識記。

自柳亞子先生的題跋在大風旬刊發表後，世人才相信今世所傳的石達開詩，幾乎都是贗品，才毫無疑問的證實了我們的考證。高旭爲了要鼓吹革命，在一個晚上做成了二十首偽托石達開的假詩，與趙之師考證出來的那位不知名的

文人偽造二百六十三首的蒲松齡假詩，動輒雖有不同，而其爲作偽却是一樣的。這在辨偽的故事裏，真是無獨有偶，相映成趣的了！這個故事，教訓我們不要輕信書籍，教訓我們要常用懷疑的精神，鑑別的眼光去評判史料。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句話是值得我們做歷史工作的人讀記的。

在這一年裏，我同時開始學習做考證論文。我第一篇論文是水滸傳與天地會。我將貴縣修志局發現的天地會文件（註：貴縣修志局發現的天地會文件，曾由我於二十三年冬送給國立北平圖書館刊行，學者稱爲「貴縣修志局本天地會文件」，乃一部重要的天地會文獻。現收在我所輯天地會文獻錄一書內，對正中書局刊行。）所載天地會的制度，來和百回本及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那個「八方共域，異姓一家」的理想，作一個比較的研究，看出這個反清復明的大秘密結社的名號，信條和組織，原來正是從水滸傳的理想淵源出來的。我把我的研究寫成一篇短論文，送呈趙之師看了，到書架上抽出一套「大清律例」，給我指出幾條律例叫我補充上去。這篇短文在大公報史地周刊發表，後來蕭一山先生著天地會起源考，他雖不信天地會成立於康熙年間之說，以爲應在較後，但他却承認此文中所引康熙年間嚴禁異姓結拜兄弟的律例，爲證明天地會成立於康熙年間最有力的證據。這一條證據，便是趙之師給我指出來的。爲了這篇水滸傳與天地會短論文後，我就繼續做一篇「上太平軍書的考證」。這是太平天國史中一個重要案。世傳蕭州秀才王爾曾上書太平軍進攻上海策。王爾是同治光緒間介紹西洋文化入中國頗有力的人，他本人却極力否認此事，說是人家誣陷他。而故宮博物

院發現的那封「上太平軍攻上海策」的信署名却是「黃曉」，而不是王瑨。究竟「黃曉」是否即王瑨呢？這是這篇考證的主題。我在這一年的夏天寫成初稿，斷定「黃曉」即王瑨，「黃曉」為王瑨的化名，送呈適之師看。適之師看了，認為證據不夠，叫我慢慢的補充證據，不要提聲張。到了秋天，我逐漸的增添了幾條證據，重寫過一遍，再送呈適之師。適之師仍認為證據不夠，但他說已經比初稿站得住。於是適之師都我訪談那些我沒有見過的王瑨著作，來和「黃曉」的「上太平軍書作辭」上的比較研究；借北平圖書館收藏的王瑨手蹟，來和「黃曉」的「上太平軍書作辭」上的對勘；寫信給蘇州顧起潛先生，請代查王瑨入學的名字，以考和「曉」字有沒有關係。後來各種材料都收齊了，我動手寫成第三次草稿，送呈適之師。適之師才認為證據充足，結論站得住。他把我這篇考證送到北京大學國學季刊去發表。這是我第一篇在國內著名的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考證。從此以後，我知道要做一篇證據充足，結論站得住的學術文章，真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適之師常常教我文章應該一改，再改，三改，方才少不錯誤。我寫這篇「上太平軍書」的黃曉考的時候，他便親身來督責我，使我一句話都不敢苟且。自從離開師家後，做文章時，我就再得不到嚴師如此的來督責我了。

五、史學研究會與北 京大學考古室

在我重入師門後的兩個月，正是北平牡丹花盛開的季節，有幾個青年人在清華同學會裏組織一個研究史學的團體，叫做史學研究會。發起此會的人，是

吳哈湯象龍梁方仲谷澍光宋慶夏鼎孫毓棠劉傳玉東九位先生。在成立那天，我也被邀約加入作為發起人。後來張蔭麟楊紹震吳經何維祺諸位先生也加入此會。會友中除吳哈先生外，我以先都不認識。吳哈是我在中國公學的同學，也是適之師的學生。我們友誼最篤。他是此會最初發起人，因為承他邀約，我才加入會來。這個研究會是友誼與研究的結合。我們會中不談黨派，不談理論；我們的目的祇是站在友誼的立場交換各人研究的心得，以盡對建設中國新史學的一點棉力。每個月我們聚餐一次，談談各人研究的情形，春秋佳日，我們又常常約定日期去郊游。我是從幼小就養成離群獨處厭惡交游的習慣的人，在大學裏，除了同鄉外，差不多可以說沒有朋友。自從入了史學研究會，遇到了這幾位富於熱情，有學養，講友誼的朋友，我才懂得朋友切磋鼓勵的樂趣。尤其是吳哈湯象龍谷澍光三位會友，對我此後的幫助最大。我們這個小小的團體，曾經主辦天津益世報史學副刊和南京中央日報史學副刊，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出版的社會經濟史集刊也是我們會友做編輯人。自離開北平後，會友星散，而今這個會是散了，每想當年北平的友情好似夢境，怎不教人惆悵啊！

我這一次再回到適之師家，不同從前鈔錄錢花先生遺集或輯錄聊齋全集時那樣，每天有一個固定的工作。祖望思杜兩弟又上學去了，適之師沒有什麼工作給我做，祇叫我自己看書。我知道適之師與師母都是十分好客的人，對我又很愛護，但是，我享受有我先本生母王老拙人那種狹介的天性，不願不勞而坐受師家的款待。因此，在重回師家那一年的秋天，我就請求適之師給我介紹一

件事做。我想當時適之師在我那閃爍的言辭裏一定猜不出我的動機吧，他立刻答應了我的請求。過了幾天，問我說：「中華文化基金會有一個文書職位，是在我下面做事的，月薪一百二十元，工作很清閒，有時間自己做學問，你意思怎樣？」我請適之師給我考慮兩天。我想：月薪一百二十元是算優厚的了，並且有工夫自己做研究，這是好的；但是文書究竟還是事務工作，和我想到一個研究機關去的志願未免相左。我將我的意思回覆適之師。他說：「是的，等我慢慢的替你再想一件工作」。那時候，適之師已經回北京大學做文學院院長了。北大研究院裏有個文科研究所，所長由文學院院長兼任。文科研究所裏面分做三部分：一部分是明清史料室，由孟心史（森）先生主持；一部分是語言室，由羅莘田（常培）主持；另一部分是考古室，當時無人主持，工作停下來了。適之師過了許久，才想起叫我到考古室，主要的工作是整理燕風堂金石拓本，職位是助理，月薪祇六十元。問我願意幹不幹。我想了一下，覺得這是一件研究的工作，不應該較職位的低下，月薪的微薄，就很喜歡的答應去幹。到了入考古室後，有人以為我不是一個金石專家，適之師叫我入考古室去未免不合人選。但適之師的看法却和他們不同，他認為金石專家做不得這件苦工作，因為專家們祇要搜他們所需要的材料，而不能耐心的從頭整理到底，祇有一個雖然不是專家但可以訓練成為專家的人才可以勝任。後來我做這件工作，前後三年，從周秦整理到宋代一直到北平陷落，我才停止。在我保管的時期，古物也沒有散失絲毫，當那國難臨頭的時候，我還珍重的將古物一一封誌好了，我才離開北平。我覺得這一件事，我還

算不曾辜負適之師的推薦。

當時適之師叫我先在家中做預備工夫，再到北大去。於是便將我的太平天國書籍卡片，文稿一包一包的捆起來，打算今後不再做太平天國研究了。而另從適之師書架上取了許多說文一類的書和金石書搬回我房間來。在大學時候，沒有金石學課程，但我却學過說文。於是我便把說文複習，每天學寫篆書幾百字，預備把各種字體認識清楚了，好得將來容易辨認金石文字，並對金石學、金石萃編、語石各書，使得略知金石學的門徑。預備了一個多月，在廿三年十月廿三日那天下午，我到了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去。文科研究所所在松公府，前面是北大圖書館，一進門，就是考古室第一陳列室，專陳列商周鐘鼎和歷代古物。從第一陳列室裏旁入去朝左轉，是一個大院子，中間是個四合院，那院坐東朝西的房子，便是我今後在那兒工作三年的考古室。在考古室右邊的兩房是語音室，左邊的兩房是考古室第二陳列室，專陳列古代經典寫本和明清珍貴的文獻。對面的西房是西北科學考察團工作室，他們在做整理木簡的工作。在考古室的後面一株高高的核桃樹下，有一所平房叫做「燕風堂」，堂中專藏燕風老人經孫氏收藏的金石拓本。經氏是晚清一位學者，他以個人三十年的精力，收集了一萬八百餘種金石拓本，其收藏的廣博，拓本的精工，海內稱最。經氏死後，這份豐富的拓本歸了北京大學，北大為了要紀念經氏的功績，所以這個貯藏經氏拓本的專室，就叫做「燕風堂」。經氏拓本專室，就叫做「燕風堂」。我到北大考古室來，便是整理這份燕風堂金石拓本。從燕風堂再入內是一個大大的廣場，種有許多樹。在廣場的左邊，坐落一座大平房，正對語音室的屋後

，那就是明清史料室。這樣疏疏的幾所屋子，便組成了研究所的全部建築。

當我打開風雲的門來時，裏面就滿牆滿壁的貯藏金石拓本的木匣子的上面，已經堆上了一層層的塵埃了。適之師給我整理的計劃是先編目錄。由適之師定了一個目錄表，印成卡片。每一種拓本要登記他的年代、地域、碑主姓名、撰人姓名、碑的高廣、碑文行數和字數，碑文漫漶剝蝕的部份等等。碑的正面要記，碑陰碑側也同樣要記。卡片上還有附註一欄，專記工作時的發現。適之師這個金石目錄表，比較以往任何金石著錄家都詳細得多，有用得多。所以我要照這個表去登記每一種拓本的目錄，不算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我每天獨自一人在考古室的長方桌子上擺上那些拓本，用尺去量他，沿著桌邊一個字一個字的去讀他，然後坐下來去登記他，偶然還有發現的地方，真是歡喜得要跳起來哩。我每天通常可以登記六種拓本，要登記完這一萬八百多種拓本就須六年，這是一件多麼遙遠途長的苦工！但我長長的做了三年，仍然毫不厭倦。雖然我在那裏所做的三年工作，而今已與風雲拓本一同付諸東流，但是，我究竟給這件工作訓練，使我養成一種更大的忍耐，一種鏗而不渝的精神去從事我此後所要做的任何一種工作，不消說，自是我學習過程中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至於北大文科研究所中，那一種特有的質樸的學風，靜穆的環境，至今還教我留戀。

在我入北大考古室沒有多久，適之師到兩廣講學，我就請他順便把我的嬰兒接出來。廿四年一月，嬰兒到了北平。我們自己租了一所小房子。那時候，我只有六十元的月薪，而每月我最低的生活費用九十元左右，除月薪外還差

三十元。因為我有一子一女，兒子上學，路費跑不動，要包一部洋車，祇是軍

的錢，便已經占了我月薪四分之一了。本來適之師曾吩咐我，若錢不夠用時，可請他想法子。我是個猜介的人，自然不願向適之師借錢的，何況他本給中華文化基金會那個優厚的薪水的位置，我却選擇這個薪水低微的工作，我還應該煩他嗎！至於家中原本也可以接濟我的，我同樣不願向老人家取錢。我決定要寫文章賣錢以補不足。那時候，每千字稿費普通二元，每月要拿三十元稿費須寫一萬五千字。我要寫什麼文章呢？這個問題却使我徘徊了。懂得金石學的人知道，在金石上偶然得到訂正歷史或訂正文字學的地方，那是一種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就是遇到了，每條也不過寫得三幾百字，所以即使是一個金石學專家，用他全部光陰，要他每月寫一萬五千字的金石學文章，也絕不可能。而況我初做金石學，白天又要做編目工作，要想寫金石學文章來補助生活，那只好吃東風！我經過了多次次的躊躇，才嘆了口氣把我那些已經包裏起來的太平天國研究重行打開來，說：「我還是再寫太平天國文章去賣稿吧！」於是為了這一個生活困難，便把我將全副精神集中於金石學研究的計劃打破了，使我不得不以公餘全部時間仍回到研究太平天國的路上去。當時我的工作分成了三方面：考古室辦公時間做整理風雲金石拓本的工作；星期日及假期到圖書館去繼續蒐集太平天國史料；晚上回家却在焚發孤燈下趕寫太平天國文章，常常寫到午夜不得休。

六、煦煦春陽的師教

我一入師門，適之師就將「不苟且」三字教訓我，我以前謹遵師教。到了

嬰兒來北平後，爲了要賣稿補助生活，一大部份文章不得不粗製濫作了。計自廿四年春至廿五年夏這一年半裏，我共寫了近四十萬字的文章。其中只有洪大泉考，此文發表於廿五年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第一卷第三期，後收入拙著太平天國史叢考內，（正中書局出版）解決了太平天國一件大疑案，為風雲金石文字目錄誤舉例（此文發表於北京大學國學季刊，卷數待查）。校出了趙雲孫氏的錯誤，那兩篇文章仍一本師教，是我的精心著作，爲適之師所稱許。此外，別的文章都是爲生活而出賣的，至今想起來還是一件痛心的事。

我十分慚愧，又十分感激，當我每次發表這種文章的時候，就得到適之師給我嚴切的教訓。

適之師對我文章第一次嚴切的教訓，是廿四年春天我登在圖書館刊上的那篇聊齋文集的稿本及其價值的書評。這篇書評，不用說是爲賣稿而寫的急就章了。其中有幾句批評聊齋文集的話說：

說到聊齋文集的價值，就這部新編的二百十九篇本來看，其中只有述劉氏行實一文是一篇好文章。劉氏就是蒲松齡之妻。松齡在這篇文章中，寫大家族的醜惡，寫劉氏的輔夫教子，刻苦成家，以及寫他自己的熱中功名與劉氏的漠視富貴等等，方面，都有深刻的描寫；在中國傳記文學中，算是一篇上乘的作品。此外各篇都是無端而代人歌哭的文章，都不能算是文學作品。所以我們拿文學的眼光來批評聊齋文集，那是沒有甚麼價值的。

適之師見了，教訓我說：「聊齋述劉氏行實一文固然是好文章，但他的文集裏面好的文章還有不少哩，你概括的

說都要不得，你的話太武斷了。一個人的判斷代表他的見解。判斷的不易，正如考證不易下結論一樣。做文章要站得住。如何才站得住？就是，不要有錯誤給人家推翻」。我回到家來，立刻把適之師的教訓記在副刊我那篇文章上面。幾年來，經過了多少次的描寫，那副刊刊，我總好好的保存着，爲的是要珍重師教。

到了廿五年的夏天，我在中央日報史學上又發表了一篇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的由來的史論式短文，其中有一段論清代士大夫好利由於清初朝廷的有意提倡，引伸清人管同郭嵩燾的話，做我的論斷的根據說：

清初朝廷的提倡士大夫務利，其用意有兩點：一、鑒於前明士大夫好名的流弊；二、企圖以利誘銷滅漢族士大夫的氣節，使他們對故國的依戀改爲對新朝的效順。關於後者，清代士大夫所願忌，自不敢加以論列。關於前者，管同曾痛論道：「天下風俗，代有所敝，承其敝而善矯之則治，不善矯之則危且亂。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皆撫，奉行文書而已。明之時，習官爭競，今則科道不敢大有論列。明之時，多講學，今則結社聚徒公然無聞。明之時，尚清談，今則場屋策士涉時政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士橫。知其弊而一切矯之，矯之誠是也。然百數十年來，其弊乃起於田野之姦，閭閻之俠，祠堂學校之間安且靜也。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繼而代者繼其末流，必觀其初意。故三代聖王有因革，必舉而盡廢之，則更起他禍」。代明人好名流弊而起的弊端是甚麼呢？管氏接續說道

：「今之風俗，弊在好談而嗜利，故自公卿至庶人惟利是趨」郭嵩燾也論道：「自漢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爲勝，吾總其要曰名利。西漢務利，東漢務名；唐人務利，宋人務名；元人務利，明人務名。二者不偏廢也，要各有其專勝：好名勝者氣必強，其流也慷慨激昂而終歸於無忌憚，好利勝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勢營私而終歸於不知恥。是說也，吾心數年前及見之，曾以告胡文忠公，自謂獨論。故明人氣勝，得志則生殺予奪泰然任之，無敢譏其非。本朝以度勝，得志則利弊賢否泛然聽之，亦無敢譏其非。一代之朝局成，而天心亦定。」士大夫到了「惟利之趨」，到了「倚勢營私而終歸不知恥」的地步，清廷發願順民走狗的目的固然達到，而政治污濁的風氣也從此造成了。我這一段話，給適之師見了，他非常生氣，寫了一封很嚴厲的信來責備我，說：

爾網：

我在史學（中央日報）第十一期上看見你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的由來」，很想寫幾句話給你。這種文章是做不得的。這個題目根本就立不成立。管同郭嵩燾諸人何以隨口亂道，他們是舊式文人，可以「西漢務利，東漢務名；唐人務利，宋人務名」一類的胡說。我們做新式史學的人，切不可這樣胡亂作概括論斷。西漢務利，有何根據？東漢務名，有何根據？前人但見東漢有黨錮清議等風氣，就妄下斷語以爲東漢重氣節。然官官相衛之制，東漢何嘗沒有？「銅臭」之故事，豈就忘之？

名利之求，何代無之？後世無人作貨殖傳，然豈可說後代無陶朱猗頓了嗎？西漢無太學清議，唐與元亦無太學黨錮，然豈可謂西漢唐元之人不務名耶？

要知楊繼盛高攀龍諸人固然是士大夫，嚴嵩嚴世蕃輩其昌諸人以及那無數歌頌魏忠賢的人，獨非「士大夫」乎？

凡清議最激昂的時代，往往恰是政治最污濁的時代，我們不能說東林代表明代士大夫，而魏忠賢門下的無數乾兒子孫子就不代表士大夫了。

明代官紳之貪污，稍治史者多知之。貧士一旦中進士，則奸人猾吏紛紛來投靠，土地田宅皆可包庇抗稅，「士大夫」恬然視爲故常，不以爲怪。務利固不自清代始也。

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訓練，但文字不可輕作，太輕易了就成了「滑」，流爲「苟且」。

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話：「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話。有三分證據，然後可說三分話。治史者可以作大膽的假設，然而決不可作無證據的概論也。

又在益世報史學二十九期見「幼樁」之「金石萃編唐碑補訂偶記」，似是你作的？此種文字可以作，此種文字就是訓練。偶爾動動，曉曉至幾百字，幸勿見怪。

我讀了適之師此信，叫教十分感激。他如此嚴厲的督責我，愛護我。我一連四個晚上伏在桌上回了一封幾十頁的長信，向他懇切的表白我的感激，報告我一年半來的工作，研究和生活的經過。

那時候，我正在打算要研究清代軍制，因並將我那個擬就的「研究清代軍制計劃」寄呈適之師，請他指導。當我的信寄到適之師時，他方入協和醫院檢查身體。得了我的信，在一天裏面，回了兩封信給我，說：

爾網：

我那封信竟使你寫那麼長的回信，我很不安。

你的回信使我很高興。我猜想「幼樁」是你，果然不錯。

你的輕視武備王祖諸人，却是不應該的。要知你所帶的，不是看碑的眼光，乃是一份份的最精的拓本，和一個許你專力做此事的機關。

我讀你已發表諸條只覺得條條都使我深刻的賞識。風堂此份拓本之精工，遠過於武備王祖諸人所見的本子。王祖經孫諸人都不以全力作整理金石之事，他們的校錄收了絕大的數目，其中有一些錯誤，是不能免的，是可以寬恕的。

我勸你撰此項金石補訂筆記之最工者，陸續送給國學季刊發表，用真姓名。此項文字可以給你一個學術的地位，故應用真姓名。又你的職務，在北大是整理此項拓本，故也應用真姓名。

我勸你以後應該減輕編輯「史學」的職務。一個人編兩個學術的週刊，是很辛苦的。

「洪大泉考」我很愛讀，因不曾帶到醫院中來，故今日不能評論此文。出院後，當再寫信。

「研究清代軍制計劃」，我是外行，恐不配批評。但我讀你的計劃，覺得它條理太好，系統太分明。此系統的中心是「湘軍以前，兵爲國有；湘軍以後，兵爲將有」。凡治

史學，一切太整齊的系統，都是形跡可疑的，因爲人事從來不會如此容易被裝進一個太整齊的系統裏去。前函所論「西漢重利，東漢重名；唐人務利，宋人務名」等等，與此同例。

最好的手續是不要先編湘軍志，且把湘軍一段放下來，先去研究湘軍以前是否真有「兵爲將有」的情形。我可以大膽告訴你：一定有的。你試看羅壯勇公年譜，便知打白匪致時已是如此了。至於湘軍以前，是否「兵爲國有」，也須研討，不可僅僅依魏忠賢條文即下結論。今日在醫院中檢查身體，早起寫此信，即問

安好 適之二五、六、二九。

爾網：

今天寫了一信，想已收到。

關於清代軍制事，鄙意研究制度應當排除主觀的見解，盡力去搜求材料來把制度重行構造起來，此與考古學家從一個牙齒構造起一個原人一樣，這可稱爲「再造」Reconstruct work。

研究制度的目的是要知道那個制度，究竟是個甚麼樣子；平時如何組成，用時如何行使；其上承襲甚麼，其中含有何種新的成分，其後發生甚麼。如此才是制度史。

你的「新湘軍志計劃」，乃是湘軍小史，而不是湘軍軍制的研究。依此計劃做去，只是一篇通俗的雜誌文章而已。其中第二、三、四章尤爲近於通俗報章文字。

我勸你把這個計劃暫時擱起，先搜集材料，嚴格的注重湘軍的本身，尤其是關於一、湘軍制的來歷（例如咸豐光的

紀效新書。

二、鄉勇團練時期的制度。

三、逐漸演變與分化。

四、水師。

五、餉源與籌餉方法。

六、將領的來源與拔升遷方法。

「幕府」可歸入此章或另立一章。

七、紀律（紙上的與實際的）。

八、軍隊的聯絡、交通、斥候等等。

（會國藩日記中記他每日在軍中上午下午都卜一二卦，以推測前方消息。）

九、戰時的組織與運用。

十、遣散的方法。

我是門外漢，所見如此，不知有可供你的考慮的嗎？

適之二十五、六、二九夜（協和醫院）

適之師在這兩封信中，教訓我，鼓勵我，指導我。他教我知道承認前人的功績，教我不得有半點自滿。他又鼓勵我向金石學上努力，以取得學術的地位。他更諄諄的指導我研究清代軍制的方法，步驟和應注意的地方。後來我做清代軍制研究，從適之師這個指示去追尋出清代「兵為將有」的起源，是由於「兵由自招」，「餉歸自籌」兩個因素所造成。這兩種情形是「軍營」所特有的；那個作為國家經制軍隊的綠營却不如如此。綠營制度有一個特點，就是「將皆選調，兵皆土著」。將皆選調，故將領的升轉操自中央；兵皆土著，故兵丁不隨將領的去留以為去留，而全國兵籍都握於兵部。至於兵餉則由戶部每年指撥，而不是歸將帥就地自籌。因此，在綠營制度下則「兵歸國有」，在勇營制度下則「兵為將有」。當嘉慶打白蓮教時，綠營已經漸漸的腐化了，將領自招的

「鄉勇」業已抬頭，羅思舉（羅壯勇公年譜是他的自傳）帶的是鄉勇，所以便已經露出了一點兵為將有的萌芽，適之師的指示是不錯的。不過，那時候，綠營雖然打仗不得力，但仍是國家經制的軍隊，故「兵歸國有」之局依然沒有什麼改變。在羅壯勇公年譜中記有一個四川綠營兵抗拒新任提督的故事，便可給我們做證明。這個故事經過是這樣的：打白蓮教時，四川綠營兵跟提督七十五久了，大家出生入死，後來七十五無辜被參革職，兵士不平，新提督豐仲來營接統，兵士便起來抗拒。但經過了一下子的談話，他們給羅思舉輕輕幾句話的勸告，便俯首帖耳聽豐仲的命令了。因為他們明白他們是國家的兵，他們吃的是國家的糧餉，他們不是七十五私人招募的，要抗拒新任提督是沒有辦法的，所以終歸不得不聽豐仲來接統。這個故事，給我們描寫出綠營時代「兵歸國有」的情形，這種情形，到湘軍時代便完全改變了。湘軍裏面，發生過一件靈營抗拒新統領張之洞接統的事件。其情形頗和從前綠營時代川兵抗拒豐仲相似，而其結果則絕不相同。綠營抗拒張之洞，張之洞不敢前往接統，後來曾國藩只得把他們解散去。因為湘軍是兵由將領自招的。餉是由將領自籌的。所以兵士祇知有他們的將領。國家也派不得別人來接統他們。咸同之間，綠營完全崩潰了，由湘軍起來代替了綠營，因此，才造成了晚清兵為將有的局面。而考其演變的起點，實始於嘉慶白蓮教之役的招募鄉勇，我把我的考證寫了一篇晚清兵為將有的起源，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社會經濟史集刊上發表。至於湘軍制度的研究，適之師的指示，更根本的改變了我的粗淺的見解，使我懂得如何去研究制度史。後來我寫的湘

軍新志，知道專注意於湘軍制本身的研究，還幸得多少位前輩讀過我文章的空白，便是開步走時就給適之師糾正了步伐的。我是這樣的一個違教的學生，適之師竟然不惜苦口婆心來教訓我，況且，他寫這兩封信的那一天，正當炎熱的長夏在協和醫院裏檢驗身體的時候，還忘不了要教訓他的一個不成器的學生。師恩如春陽，我好比一株飽受春陽煦育的小草，叫我怎能說得出我的感激哩！

二十六年春天，我那部太平天國史綱出版了。這部小書，是我在二十四年底至二十五年初的三四個月的晚上拖着疲乏的身體寫成的。因為那時候北平時局不安定，妻兒回里借了一筆旅費，所以要寫一部稿子寄錢來填補。我為此書的對象是中學生，因此許多材料都沒有用到；一些有學術性質的考證也沒有收入裏面去。到了印出來，我送一本給適之師，他看了，責備我說：「你寫這部書，專表揚太平天國，中國近代自經太平天國之亂，幾十年來不曾恢復元氣，你却沒有寫。做歷史家不應有主觀，須要客觀的真相全盤托出來，如果忽略了一邊，那便是片面的記載了。這是不對的。你又說五四新文學運動，是受了太平天國提倡通俗文學的影響，我還不曾讀過太平天國的白話文哩」。適之師的話，叫我毛骨悚然！太平天國之役，十五年來期大戰，毀壞了多少文物，摧殘了多少都市和農村，兵災疫癘的浩劫，生民流離的悲慘，我都蒐集有此類史料，我為什麼在此書中不作詳細的敘述呢？這便好像是有意的把那些殘酷的事實掩蔽了。法國歷史家凡德爾（Vandier）在開闢法國大革命演說時說過：「我們的演說，不要越出兩端之外；一端是教人革命，一端是不教人革命。演講家只能自處於歷史家的地位，

討論歷史，不要存什麼成見，也不要預存結論，也不要發表什麼過激的議論」。我這部小書不正成為「教人革命」的宣傳品了嗎！至於太平天國提倡通俗文學一事，我祇可以說太平天國曾有此種提倡，但卻不能說五四新文學運動是受了他的影響而來。我這種牽強附會的說法，正違犯了章炳麟所論經師應守的「戒妄牽」的信條（見太炎文錄說林下），也就是違犯了適之師平日教我們「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三分證據說三分話」的教訓。我站在適之師面前，默默的恭聽他的教訓，在那一瞬間，教我因電一般想起了那件往事。那是二十三年的夏天，陳仲甫（獨秀）先生還在南京獄中，他也打算做太平天國研究。汪原放先生是仲甫先生的年家子，（原放先生的學人仲甫先生是清末在江南讀書時的同學，故有此年家的交誼），常送衣物去給他。仲甫先生就叫原放先生替他買了幾部坊間出版的太平天國著作，連我那部放在重慶圖書館的「太平天國廣西起事史」未刊稿也送去了。仲甫先生却特別的讚賞我那部粗疏的稿本，問了原放先生，才知道我是一個跟適之師做學問的人。他同原放先生說：「請你對適之說可以請羅先生來南京和我談談太平天國嗎？」原放先生寫信告知適之師。那時候，重慶圖書館編輯章希呂先生也住在適之師家，適之師笑對希呂先生和我說：「仲甫也要研究太平天國，他對原放說想請爾綱去南京和他談談。仲甫是有政治偏見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國，還是讓爾綱努力研究吧」。那時，適之師對我的希望是如何的懇切呢！我而今却寫出這樣荒唐的東西，使他又是如何的失望啊！我想起了這一件往事，教我滿面羞慚抬不起頭來。後來這

部小書給大公報圖書副刊刊爲一部具備時、地、人的條件的好著作；當時有一種專評新書的書人雜誌，又列爲那時出版的中國最新佳作之一；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出版的經濟學報也有好評；就是到了最近蕭一山先生評論中國近代史著作還推爲「簡明可誦之作」，那真教我慚愧無地了！

適之師教訓我常常如此的嚴切。他的嚴切，不同夏日那樣可怕，却好比煦煦的春陽一樣有着一種使人啓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動，教人奮發。

× × ×

我在北大考古室，做了兩年，還是助理。因爲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升遷，向例是少有的，所中同事們往往做了六七年未遷一階，所以我自然也同樣的待遇。但朋友們在別個機關，却年年升轉，他們都爲我着急，湯象龍梁方仲兩先生在南京把我的情形向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陶師長孟和先生說了，孟和先生便托羅莘田先生北歸時，代請適之師提高我的待遇。孟和先生和朋友們對我的好意，我是十分感激的；然而適之師的困難，我却是知道的。他在北大一向不用一個私人。他把我安置到考古室去，已經是破例的了。他做文科研究所的主管人，別的同事不升遷，如何能把我升遷呢？我將這情形向朋友們解釋，但他們却仍不以爲然。二十五年春，清華大學史學系主任教授蔣廷黻先生去做駐蘇聯大使，遺下中國近代史功課，我的朋友吳辰伯（時）先生便把我推薦到清華去，清華文學院院長馮芝生（友蘭）先生就到北大文學院適之師處，請我去清華教這門功課。適之師是很高興的，因爲他的一個無名的學生，已經給人家看得起，但他却替我辭謝了清華的聘請。這個消息，給朋友們知道，除了辰伯

先生歎氣不說話外，都不免憤激起來。他們以爲適之師在北大既然不升我的級，又不放我到清華去，是看不起我。其中有一位最激烈的朋友，他幾乎要去質問適之師。那時候，妻兒已經回了家鄉，我住在一個朋友的宿舍裏。那兒是我們史學研究會友聚集的會所。我平常每到星期日早上，就到適之師家去看望思杜弟的功課。自從適之師替我辭謝清華聘請的事後，朋友說：「適之先生既然看不起你，你還有面子上他家嗎？」朋友是少年氣盛的，不由我分解，一到了星期日，他們就拉我遊公園，不許我到適之師家去。如是有兩月之久。朋友們又替我向別方面活動，谷鍾光先生把我向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推薦，湯象龍梁方仲兩位先生把我向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推薦。到了五月底，兩處同時聘請我。朋友才放我到適之師家去告知適之師。我懷着一種躊躇起跳的心情，走進了適之師家。師家的人，以爲我害病了，許久沒有來，但適之師心裏明白。他等我把我說的話說了，就說道：「爾爾你生氣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讓你到清華去，爲的是替你想，中國近代史包括的部分很廣，你現在祇研究了太平天國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況蔣廷黻先生是個名教授，你初出教書如何就接得他的手？如果你在清華站不住，你還回得北大來嗎？」他停了一下，接着說：「我現在爲你着想，還是留北大好，兩處都不要去。你到別個機關去，恐怕人家很難賞識你」。我聽了適之師的話，一腔熱淚，湧上眉睫，他不以我的愚頑而責備我，仍然一樣的爲我的前途打算。我明白了，我完全明白了適之師對我的愛護。我要用我的淚洗滌我的罪過。等到辭別了適之師，一踏上洋車，眼淚就忍不住流出來了。

後來適之師給我決定：北大把我升爲助教，加薪二十元，考古室添助理一人，書記一人，幫助我工作。另外每月領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津貼五十元，研究清代軍制。到第二年夏天，考古室助理工作上軌道，北大才准我辭職轉入中央研究院。

這一年秋天，妻兒再從家鄉來北平。那時候，我每月有一百三十元的薪津，我仍然過着九十元一月的生活，每月有四十元剩餘。我就將這一筆錢來做我購買書籍的費用。我不要再寫文章賣錢了。本來我到了北平就養成一種訪書的嗜好，成爲一個最感興趣的生活。爲了要有餘錢，我到琉璃廠陳福壽頭髮胡同東安市場各處書店、地攤、攤子去訪書的工作更走得勤了。那幾本珍貴的曾國藩手批嘉慶皇帝紀略進呈本，王韜手鈔本謝介菊金陵癸卯紀事略，左宗棠致張曜書真蹟，海內孤本明刻本今古奇觀殘本，乾隆帝硃批異域瑣談，都是在這一年內訪得的。此外，並專收清代軍制的書。我歷年陸續收得許多光緒宣統年間創辦新軍的史料，後來我在中央研究院便得利用這些史料來寫晚清兵志一書。

因爲生活的比較優裕，所以我便得有悠閒的心情來常常反省自己，和靜觀各方面的機會。我覺得適之師那句：「你到別個機關去，恐怕人家很難賞識你」的話，好似暮鼓晨鐘一般警告着我。我這個人，性魯行方，不會應付人事，不是適之師，誰能同他這樣愛護我，體諒我，寬恕我，棄我之短而錄我之長呢？我還是再跟適之師在北大吧。北大升遷雖然不易，我還是安貧守拙的好。我經過一年長長的考慮，到了二十六年五月底，看看快要到接受中央研究院的聘約的時候，我毅然把我願留北大的決定

告知適之師。適之師十分歡喜，因爲他那個頭等的學生現在看清楚自己了。他安慰我，並且鼓勵我說：「你願留北大，我十分歡喜。北大是能够讓你好好的發展的。你從下半年起，半天做整理風堂金石拓本，半天做研究工作，隨你自己的意，做研究金石學也好，做研究清史也好。至於中央研究院方面，我替你向孟和先生商量，仍領津貼研究清代軍制」。事情決定了，我眼前充滿光明的，一種恬靜的愉快的心境教我安身立命的留在北大。怎知道不到兩個月，蘆溝橋的烽火就把我這個決定打破了，使我不得不離開北大。

韶光如逝水般過去，離別師門，快要六年了。寂寂的中年倏忽的已經到來。想起我往日受過的那煦煦春陽般的師教，我應該如何的努力將來，然後方才不致始終成爲一個有辱師教的人呢！

羅家倫講的三個故事

史
51.
3.
2.

反對日本侵略

增進中美友誼

支持全民抗戰

羅先生說，愛國是義之所在，但臨危不屈，則非大仁大勇者所不能爲。羅先生認為胡先生最困難的，是擔任駐美大使的時期，因之他說出一段中美外交史實。

羅家倫先生說，在一九四一年九月間，日本即與美國政府開始秘密談判中國與西南太平洋的局勢，並派野村與來栖剛大使在華盛頓執行談判任務。在這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日本方面向美國國務卿赫爾提出一種所謂臨時妥協方案(Motus Ventii)，其中和我國關係最重大的就是要求美國停止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一切道德的與物資的援助，並讓日本取得充分石油的供

應，以和緩雙方緊張的局面。經蔣委員長詳加考慮後劇烈反對，並電告當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博士，胡先生即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美國時間，中國爲二十六日）向美國國務卿親自提出嚴重抗議，赫爾爲之動容。第二天，他約胡大使會談，結果赫爾決定把這個臨時妥協方案打消了。這件事不但

在十二月六日（美國時間）胡適先生赴紐約參加該市重要人物爲他所設的盛大宴會，並要他發表演說，在夜間入席以前一小時候，說國駐美大使館長送話即達到他，說是接到白宮電話，羅斯福總統約胡大使前往談話，胡先生因有約在先，不能即回，於是約定在第二天十一時到白宮相見。他半夜乘火車趕回華盛頓，十一時到達白宮，羅斯福開口就說：「胡適——他們有很親密的友誼，所以不拘形跡，連名帶姓的叫——那兩個傢伙（英文用Those two）的意思稱野村、來栖）方才離開這裏，我把不能妥協的話，堅定的告給他們了。你可以即刻電告蔣委員長。可是從此太平洋上隨時有發生戰事的可能，可能發生在菲律賓及關島等處。」胡先生聽了之後，向羅斯福總統告辭，遂即往白宮附近的國務院去找有關係的朋友談談。這正在午餐的時候，正副國務卿都回家了，祇有主管遠東事務的司長福恩倍克（Hornbeck）還在辦公室，此人是專家也是老友，他們約略談了一下，胡適大使就回大使館，正在進午餐，忽然白宮電話又來了，是羅斯福總統親自打的。開口又是一「胡適！方才接到報告，日本海軍已在猛烈襲擊珍珠港！」胡先生隨即用急電向政府報告。他說：「這使我爲國家民族慙了一口氣，太平洋局勢大變了。」

羅家倫先生說，以上這些話是在民國三十四年秋間，他和胡適博士一起對英國開「聯合國文教科組織」會議時，同住倫敦克萊琪旅社（Clarendon Hotel）中夜間，胡適博士與他談的，他並有筆記留下。羅先生說，這件大事可以說是與抗戰成敗有著重大的關係。這項決策雖是由於當時蔣委員長的明智和堅定，但是執行的大使在其駐在國的聲譽、人望，及其和營局的友誼與互信，不能說不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我所親炙的胡適之先生

程天放

穿長衫的留學生

我第一次看見胡適之先生，是在民國七年五月間。那時我是復旦大學三年級的學生，一天晚上，適之先生到江蘇省教育會公開發言，由適之先生翻譯，我和許多同學都去聽。當時適之先生在一新青年上鼓吹文學革命，批評舊傳統，舊習慣，舊道德，也談及他的照片。在會場上，我們就認出他是怎樣一個人物，大家以為他一定西裝革履，神氣十足，是一個典型的留學生。等到他帶着走上海路台時，穿的是一件長衫，頭髮也梳成一個大髻，我們覺得這件長衫，和舊傳統和舊道德，不啻是兩極相反的。這初見的印像，深深刻在我腦海中。

我的口試主持人

我第二次看見適之先生，是在民國九年夏天，我到北京，參加教育部舉辦的各省公費留學生考試。我報考哲學門，由適之先生主持口試。那時適之先生的人不多，所以口試時間了我相當久。那次口試後，一直到民國十八年，我擔任安徽省教育廳長，有一次到上海，才到適之先生的寓所拜訪，請教他關於教育的見解。此後

又一年，到民國二十七年八月，我辭去駐德大使職務，經過倫敦返國，那時他恰好也在倫敦，我們在大使館同席，而且又住同一家旅館裏，可是我到倫敦第二天，他就去美國，所以談話時間也不多。

同住在一個旅館裏

三十四年十一月，抗戰勝利後聯合國文教組織在倫敦召集制憲會議，政府派代表團參加。適之先生是首席代表，我是代表團之一，另外三位代表是羅志希、趙元任、李濟先生。我和適之先生又同住一個旅館裏，整整四週的時間，我和他朝夕在一起，我對他的思想行為才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同時他對我的了解也可說是從那時開始。回國後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我則在南京供職，要等到他到南京開會的時候，才有機會見面，可是他的事情忙，訪客多，所以無法深談。三十八年九月，政府派我出席聯合國第四屆大會，那時適之先生正在紐約。我在紐約三個月，那時適之先生到紐約多次，每次談一兩小時。當時政府由南京遷廣州，由廣州遷重慶，由重慶遷成都，最後退到瀘州。許多知識分子都向中共靠攏，最後退到瀘州。可是適之先生對自由民主的信仰堅定不搖，認為反民主反科學反人性的共產黨必然失敗。

上天下地無所不談

在三十九年到四十二年我擔任教育部長期間，適之先生曾返國兩次，每次我都和他暢談共和改進教育等問題。四十四年春天我應邀到美國講學，在紐約住了一年，常和適之先生見面。四十六年夏天我回國，四十七年四月他也返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這三年多我因為職務比較清閒，所以常到南港去請教。我們所談的包括政治、教育、科學、文學、歷史、哲學、宗教、藝術等，真是上天下地，無所不談。適之先生極其開朗，博學，使得我得益匪淺。我尤其感激的，是在我寫「美國論」期間，給我許多鼓勵，並且在「美國論」出版後，寫了一篇三千多字的「附後記」。

最後一次的談話

我最後一次和適之先生談話，是今年二月十日。我到福州街廿六號去見他，他很快地告訴我三天前收到朋友從美國寄來他五十年前寫的「留學日記」的一篇，文章「事隔半世紀」，他立即將它影印，並且贈送我一一份。那篇日記有四千多字，是用文言寫的。我講「這篇日記真得珍貴，因為你四十多年來已經不再寫文言文了，因為你四十多年來已經不再寫文言文了」。我當時匆匆看了一遍，完全是史記漢書列傳的文體。我就對他講：「因為你的國學功夫很強，所以改寫白話文後，非常流就寫不出很好的白話文」。他不問我的

舊道德的楷模

這微的格調，循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真是非常允當。

平易近人的大師

第二，地位高的人往往有驕矜的態度，盛氣凌人，學問好的人又往往有近人情的怪脾氣，不容易和別人相處。適之先生是一代大師，名滿天下，但是也非常溫和和藹，平易近人。他對政治、社會、教育、文化、各方面重大問題，都有主張，可是他決不抹殺旁人的意見。我仰他多次，長時間談話中，常常提出和他不相同，甚至相反的意思，他一一點不見怪，有時還為我的理由充分，不惜掩己從人。有些寫文章批評他的人，常常用過火的語句，他對我說，「這是個刺我，但是惹不起生氣。他對任何人都有禮貌，都很親切，有許多青年為他這種謙遜的態度所感動。他的生活很簡單，飲食很隨便，一點沒有怪僻和名士氣，他對僕役也從來不加呵斥。因此，他生前可以和任何階層的人接近，也因此，他死後還得商人、學生、和他的司機的限額。

政府的諍友

第三、適之先生除了收過四年的駐英大使外，一生都是從事教育和學術工作，可是他為了對國家民族的前途，不能不踐政治，不能不寫有關政治的文章。因為他是個學者，而從政的經驗又大，所以他的政治主張有時免不了天真，例如四十五年的政治主張有時免不了天真，總統國民黨可以向他談起，曾建勳總統國民黨可以

動分而爲二，以實行兩黨政治，我當時就講事實上是不行的。毋庸諱言，他對國民黨有不滿意的地方，對政府也有不滿意的地方，可是他只是向黨的負責人或政府負責人當面直言，而決不任意公開批評，尤其不肯在外國人面前講本國政治上的缺點，來削弱政府的威信。這和有些自命民主人士比較，專門在美國人面前罵政府，企圖以美國的力量來推翻政府，讓他們掌握政權，人格的高低真是不可以道里計了！近年來凡是想利用他的聲望，來做反政府反國民黨的幌子的，都爲他所拒絕。這說明他是國民黨和政府的一個諍友，他的批評完全出於愛國家、愛民族的動機，他個人係毫沒有政治野心，也係毫沒有權位觀念。